

道家与 中国哲学

魏晋南北朝卷

孙以楷 主编

陆建华 沈顺福

程宇宏 夏当英 著

人民出版社

道家与中国哲学

魏晋南北朝卷

孙以楷

主编

陆建华

程宇宏

夏当英 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田 园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家与中国哲学(魏晋南北朝卷)/陆建华、沈顺福、程宇宏、
夏当英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

ISBN 7-01-004055-9

I.道… II.①孙…②陆… III.道家-关系-哲学思想-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B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5813 号

道家与中国哲学(魏晋南北朝卷)

DAOJIA YU ZHONGGUO ZHEXUE

孙以楷 主编

陆建华 沈顺福 程宇宏 夏当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2.875

字数:264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4055-9 定价:2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引 论 / 1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政治及其对哲学的影响 / 2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的发展 / 10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 24

第二章 老子思想与正始玄学 / 36

第一节 正始之音 / 36

第二节 夏侯玄与老子 / 45

第三节 何晏与老子 / 48

第四节 王弼与老子 / 54

第三章 庄子思想与竹林玄学 / 64

第一节 竹林玄学简释 / 64

第二节 山涛、王戎、刘伶、阮咸与老庄 / 66

第三节 向秀与庄子 / 70

第四节 阮籍与庄子 / 79

第五节 嵇康与庄子 / 93

第四章 道家与西晋玄学 / 106

- 第一节 郭象与庄子 / 106
- 第二节 裴颀与老子 / 118
- 第三节 杨泉与道家 / 122
- 第四节 欧阳建与道家 / 126
- 第五节 鲍敬言与道家 / 129
- 第五章 道家与《列子》、张湛 / 134**
- 第一节 《列子》与道家 / 134
- 第二节 张湛与道家 / 156
-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道教的发展 / 177**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道教史略 / 177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道教主要代表人物理论述要 / 183
-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道教理论与老庄 / 226**
- 第一节 道家与道教 / 226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道教对老庄的神化 / 230
- 第三节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道教 / 233
- 第四节 老庄思想对魏晋南北朝道教理论的影响 / 237
-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道教理论与玄学 / 247**
- 第一节 玄学与道教理论上的异同 / 247
- 第二节 玄学对魏晋南北朝道教理论的影响 / 261
-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道教理论与儒学 / 268**
- 第一节 儒家伦理学说对魏晋南北朝道教理论的影响 / 269
- 第二节 儒家礼制对魏晋南北朝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 / 279

- 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道教理论与墨学 / 284**
- 第一节 魏晋道教承传墨学的途径 / 284
- 第二节 墨子天志明鬼、兼爱非命的思想对魏晋南北朝道教的影响 / 289
- 第三节 墨学认识论对魏晋南北朝道教的影响 / 295
- 第四节 墨学“五行毋常胜”观念与道教对五行说的发展 / 298
- 第十一章 魏晋南北朝佛学发展概述 / 301**
- 第一节 汉魏佛教简介 / 301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理论问题与佛教派别 / 309
- 第十二章 道家与魏晋般若学 / 314**
- 第一节 空与无 / 314
——老庄、玄学与六家七宗
- 第二节 “体用非一非异”与“万物体同于一” / 329
——老庄、玄学与僧肇
- 第十三章 道家与魏晋南北朝涅槃学 / 349**
- 第一节 “冥神绝境”与“无生为反本” / 349
——道家思想与慧远哲学
- 第二节 道家与竺道生 / 363
- 第三节 南北朝禅法的流行与道家思想 / 375
- 第十四章 道家与南北朝形神之辩 / 378**
- 第一节 范缜前后的形神之辩 / 379
- 第二节 范缜神灭论与道家思想 / 387
- 主要参考书目 / 399

第一章

引 论

魏晋南北朝卷所论道家与中国哲学,上限为公元220年,下限为公元589年。

公元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废献帝而称帝,都洛阳,国号魏。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公元229年,孙权称帝,都建业,国号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夺取曹魏大权;公元263年,司马氏灭蜀,刘禅出降;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而自立,都洛阳,国号晋,史称西晋。公元280年,晋灭吴,重新统一中国。公元316年,愍帝司马邺降刘曜,西晋亡。公元317年,司马睿称晋王,次年称帝,都建康,史称东晋。与江南的东晋政权相应,北方在混战割据中所建立的政权史称“十六国”。公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国号宋,宋以后有齐、梁、陈,统称南朝。公元386年,拓跋珪称代王,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魏,史称北魏,北魏之后有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统称北朝。公元581年,杨坚废周静帝自立,国号隋;公元589年,隋灭陈。以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时间长达近

370年,但它并不是所谓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阶级构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思想的发展及其对中国哲学所产生的作用就发生于上述“天下大乱”的时代中。

本卷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家与中国哲学之关系,引论主要论述三个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政治及其对哲学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的发展,道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哲学所起的作用。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政治 及其对哲学的影响

一、魏晋社会政治与玄学

汉代,儒学独尊;汉亡,儒学的政治地位严重衰弱。公元203年至217年,曹操先后发布《论吏士行能令》、《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令文名称系严可均编《全三国文》时所加),主张“明扬仄陋,唯才是举”(《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四部备要》18,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引《三国志》均同此),甚至说有“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偏离儒家仁义忠孝。魏明帝太和初期,部分贵族弟子轻视儒家经典,“浮华不务道本”(《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明帝下诏止之,然未能奏效;太和六年司徒董昭上书明帝,要求严惩“浮华”分子,明帝再次下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浮华分子的代表人物。景初三年,明帝曹叡

去世，曹爽与司马懿共辅齐王曹芳即位，在曹爽扶持下，当初的浮华少年夏侯玄、诸葛诞、何晏、邓飏、丁谧、李胜、毕轨等东山再起，集结于曹爽周围，且成为曹魏集团对抗司马氏集团的中坚力量。正始年间，何晏、夏侯玄之类浮华人物大权在握，一方面清谈论辩，畅言老庄，醉心于“以无为本”，将太和时的“浮华”发展为正始时的“玄学”思潮；另一方面积极提携比他们更年轻、更富有理论创造力的新一代天才少年王弼、裴秀、钟会等。

嘉平元年，曹爽等随曹芳拜谒明帝高平陵，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曹爽及其亲信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桓范等皆以谋反罪死并诛夷三族。但是，何晏等扶持的新一代玄学人物王弼等由于在政治上没有直接依附曹魏集团，少有人受株连，大都幸免于难。正始玄学末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远离政治漩涡、回避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矛盾斗争，思想理论上则揭露斥责司马氏集团所标榜的虚伪名教，追求退隐清谈的风气和清高傲世的品格，形成竹林玄学。司马氏篡权之后，阮籍被迫为官，山涛、王戎、向秀等先后投靠司马氏，竹林玄学走向分化乃至瓦解。由于司马氏提倡礼教，标榜以孝治天下，被迫为官的阮籍与公开对抗司马氏的嵇康坚决反对名教，借解《庄子》表达心中郁闷和政治思想。

竹林玄学之后，西晋玄学沿着贵无和崇有两条路径向前发展。但二者基本上都是顺应司马氏奉儒学为正统的政治需求，在主观和客观上为西晋王朝的长治久安服务。王衍、乐广循何、王“贵无”学说，试图纠正正始玄学过分崇道的偏差，王衍认为“老庄与圣教同”（参《世说新语·文学》，《四部备要》55，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引《世说新语》，均同此），乐广指出“名教内自有

乐地”(《晋书·乐广传》,《四部备要》19,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引《晋书》均同此)。杨泉、欧阳建、裴颢等对贵无学说加以批评,杨泉《物理论》曰“夫虚无之谈,尚其华藻”(《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两汉隋唐编》,第359—362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无异于春蛙秋蝉的空喊;欧阳建抓住贵无派的“言不尽意”,撰《言尽意论》;裴颢在贾后执政时期为贾后近臣,官至尚书仆射,参与处理朝政机要,深感新旧贵无论的危害性,著《崇有论》。郭象同王衍、乐广、裴颢等属同时代人,他发挥向秀《庄子注》,在贵无、崇有之上提出“独化”论,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终于解决了魏晋以来玄学的“儒道合”的难题。可惜,西晋随后即亡。东晋时,佛教和道教经过汉魏西晋的积蓄大放异彩,不仅东晋帝王、官僚推崇佛道,就是玄学名士也投入其中。在此政治和学术风气下,玄学的社会影响犹在,玄学理论则停滞不前,张湛的《列子注》是东晋玄学的惟一代表性著作,其间又夹杂佛教教味。张湛之后,再无玄学大家出现,这预示着玄学的终结。

二、魏晋南北朝社会政治与道教

道教创立于东汉。五斗米道的创立者是张陵,太平道的创立者是张角。张角利用太平道发动起义,后失败。五斗米道经张陵、张衡,传至张鲁。张鲁降曹操,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其大批信徒也由蜀地北迁到关陇、洛阳、邺城等地。曹操本人“好养性法,亦解方药”(《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张华《博物志》),可谓精通道教,然其靠镇压黄巾军起家,深知道教的社会影响和感召力,其招引方术之士,如甘始、左慈、郗俭、华佗等,授以官职,目的是“聚而禁之”(曹植:《辩道论》,见《广弘

明集》卷五,《四部备要》55,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引《广弘明集》均同此)。曹魏初期,魏文帝曹丕重视儒家,严禁民间的宗教活动。魏明帝沿袭曹丕的宗教政策,禁止有违儒家礼教的民间祭祀。但是,事实上,曹操本人允许道士传播道术,也曾向道士学习养生术和御女术;魏国文人和官吏多从道士学习方术。这样,道教在魏国禁而不衰。孙策对待道教的态度与曹魏相似,他曾将著名道士于吉斩首,“悬首于市”(《三国志·吴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孙权及其继承者则佑护、提倡道教,孙权宠信姚光、介象等方士,建桐柏、崇福等道观;景帝孙休召道士吴春,验其辟谷之术。东吴一时成为道教兴盛之地。

西晋初,仍对民间宗教活动加以禁止,晋武帝即位时下诏曰:“……其案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祇淫之鬼不乱其间”(《晋书·礼志》),后又“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四方,循省风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晋书·武帝纪》)。但是,西晋道教依然活跃。西晋末东晋初,在道教发展史上出现了杰出的道教理论家葛洪。葛洪祖、父两代任东吴要职,父悌入晋后,任郡陵太守。晋惠帝太安年间,葛洪任将兵都尉,后因功迁伏波将军,其后弃官归隐,锐意修道成仙。晋室南渡,封之为关内侯。晋成帝欲任之为散骑常侍,葛洪坚辞不就。后至罗浮山炼丹著述,终其一生。葛洪之后,道教于东晋大兴。晋哀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晋书·哀帝纪》)“简文帝先事清水道师”(《比丘尼传·道容尼传》,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1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晋书·简文帝纪》称其“履尚清虚,志道无倦”。孝武帝儒释道并重,重儒、崇佛、信道。东晋末代皇帝恭

帝亦沉湎佛道。东晋王室崇奉道教，门阀士族集团同样如此。例如：王氏家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诸子均信五斗米道。郗愔与其姐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晋书·郗鉴传》）。另外，道教在十六国时期也有所发展。道士张忠避永嘉之乱，隐于泰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晋书·隐逸传》）前秦苻坚欲征之，命之为“齐尚父”，张忠坚辞不就；道士王嘉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苻坚屡屡征之，不就。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极盛之时，也是道教变革与发展的黄金时代。晋宋之际的道经，诸如《上清三天正法经》、《渊洞神咒经》、《三天内解经》等，为刘宋续汉代晋制造谶言，反映了道教希望通过刘宋政权的支持得以兴盛。宋文帝尊崇道教，闻陆修静至京师而召之入内，请其讲经说法，当时，太后王氏竟降母后之尊，执门徒之礼。孝武帝信巫，曾请巫师为其召唤死去的宠妃。前废帝及明帝均迷信道教。齐末，萧衍起兵代齐，陶弘景拥戴之；萧衍称帝，陶弘景援引图谶，以为国号当为“梁”。萧衍因之礼遇陶弘景，并且视之为“山中宰相”（《梁书·陶弘景传》，《四部备要》20，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引《梁书》均同此）。梁武帝之外，简文帝、元帝等都是道教信仰者，简文帝即位前曾召见陶弘景，与之论道；元帝称其在隐士中最推崇陶弘景。北魏道武帝“好黄老，颇览佛经”（《魏书·释老志》，《四部备要》21，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引《魏书》均同此），明元帝效法道武帝“亦好黄老，又学佛法”（同上），在宗教政策和宗教态度上佛道并重。由于服食道士所炼长生药，道武、明元二帝皆中毒身亡。魏太武帝初

对佛教无恶感,后受崔浩、寇谦之蛊惑,崇道灭佛。从太武帝起,北魏诸帝皆须亲自到道场,接受符箓仪式。据《隋书·经籍志》载,这一制度延续至北周:“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隋书·经籍志》卷35道经,《四部备要》22,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引《隋书》均同此)由此可见道教在北朝的地位。不过,道教从太武帝时的极盛,又有其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北魏文成帝时,道教归属僧曹管理,道教坛宇改称为寺。东魏孝静帝虽设立道坛,然朝中掌握实权的人物信佛。齐文襄王于公元548年罢除道坛,齐文宣帝乘道教在道佛之争中失败而下诏废道。

三、魏晋南北朝社会政治与佛教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东汉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楚王英传》,《四部备要》17,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引《后汉书》均同此),是最早的有史料查证的佛教信仰者。汉末,桓帝在宫中祭祀黄老和浮屠:“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后汉书·桓帝纪》)“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后汉书·西域传》)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安息人安世高来到洛阳,其后,支娄迦讖也来到洛阳。三国时,魏国文帝曹丕、明帝曹叡对黄老神仙方术、鬼神祭祀均明令禁止,而佛教在当时被混为黄老方术,也在禁止之列。魏中期,佛教禁令有所松弛,僧人的译经和传教又继续进行。昙诃迦罗于嘉平年间、康僧铠于嘉平末年、昙帝在正元间、帛延于甘露年间,先后来到洛阳译经。甘露五年,朱士行出家学道,西去于罽求取《般若经》,成为西行求法的第一位中国僧人。汉末,许多人为逃避战乱而避居吴地,其中有佛教徒。汉

献帝末年，支谦避乱于吴，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拜其为博士。（参见《出三藏记集·支谦传》，第517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下引《出三藏记集》均同此）孙权之后，孙登、孙亮均喜好佛教，可见东吴政权对佛教持肯定、赞赏态度。支谦及在其后来建业的康僧会（公元247年从交趾来到建业）的译经传教工作，使得佛教在吴国传播开来。孙皓即位后，曾“废弃淫祀，乃及佛寺并欲毁坏”（《高僧传·康僧会传》，第16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下引《高僧传》均同此），也赖康僧会的辩才方得以幸免。

西晋时期玄学兴盛，但佛教也逐渐流行。晋武帝时“寺庙图像”，“崇京邑”（《高僧传·竺法护传》，竺法护为“弘大道”，至西域游学。晋惠帝元康元年竺叔兰和无叉罗译出《放光般若经》，“大行京华，息心居士，翕然传焉”（《出三藏记集·合放光光略解序》）。西晋王室中，信奉佛教的有中山王、河间王等。据说，中山王为恭迎《放光般若经》，与众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同上）。河间王尊帛远为师友，常与之共论道德。西晋名士中，信佛者甚众。例如，周嵩夫妇信奉佛教，珍藏《小品》（即《放光般若经》），西晋末避难时也携带之。后周嵩犯法，临刑于市时仍诵经不已。东晋时，玄学大有衰落之势，而佛教日盛。东晋帝王诸如元帝、明帝、成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均信佛崇佛，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更有利的客观条件。元帝、明帝“游心玄虚，托情道味”（《世说新语·方正》注引《高逸沙门传》），敬重和礼遇竺道潜等。明帝善书画，最善画佛像（参见《历代名画记》卷五）。成帝时发生沙门是否应敬王者的争论，未有定论。哀帝“好重佛法”（《高僧传·竺道潜传》），频频遣使征请竺道潜入宫，开讲《小品般若经》。简文帝认为佛教能陶冶性情，给人以

精神寄托，曾率群臣莅临瓦官寺听竺法汰讲解《放光般若经》。孝武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晋书·孝武帝纪》），佛教僧尼得以出入宫廷，干预朝政。恭帝深信佛教，竟“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晋书·恭帝纪》）。东晋的朝臣和名士多信佛。王导、庾亮、周顓、谢琨、桓彝、何充、殷浩、谢安、王羲之、许询、孙绰、郗超等等，均信奉佛教。北方十六国时期佛教畅行。后赵石勒崇信佛图澄，“有事必谘而后行”（《高僧传·佛图澄传》），号之为“大和上（尚）”；石虎以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其事奉佛图澄有甚于石勒。前秦苻坚素仰道安之名，其克襄阳，为得道安。并称赞道安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高僧传·道安传》）。道安因之参与前秦政事。此外，苻坚还命吕光、姜飞远袭龟兹，虏鸠摩罗什。前凉盛行佛教，《魏书·释老志》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后凉吕光及其后继者虽不信佛，然亦礼待鸠摩罗什，常以国事问之。后秦姚兴迎请鸠摩罗什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高僧传·鸠摩罗什传》）。姚兴本人读经著述，著有《通三世论》、《通三世》等。

同两晋十六国时一样，南北朝期间政治斗争十分惨烈。政权更迭如昼夜交替，战争频繁无以复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此局面下，统治者倡导佛教，被统治者需要心灵慰藉，佛教终于走向全盛局面。南朝皇帝多信佛。宋武帝礼敬慧严、僧导。宋文帝尤重佛法，赞赏竺道生的顿悟成佛，曾和慧严、慧观等讨论佛理。宋孝武帝造新安、药王两寺，让僧人慧琳参与政事。宋明帝崇佛，其修复佛寺诏云：“妙训渊漠，有扶名教。”（《宋书·夷蛮传·天竺迦毗黎国寺》、《四

部备要》20,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引《宋书》均同此)齐王室笃信佛法,齐文惠太子、豫章王萧嶷、竟陵王萧子良等均事佛。萧子良招名僧讲论佛法,非难范缜《神灭论》,认为佛学助教化,著有佛教著作。梁武帝原奉老子,后舍道事佛,列佛教为国教,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著佛教著作数百卷,优待僧侣,广建佛寺。受武帝影响,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均好佛。陈代帝王诸如陈武帝、陈文帝、陈宣帝等都是佛教信徒和支持者。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虽遇曲折,总的说来,还是势不可挡。北朝帝王大多数仰佛,排佛者惟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北魏道武帝好黄老,读佛经,礼敬沙门,用佛教教化人心;明元帝在都城四方建立佛像,令沙门用佛教灌输民心;太武帝初信佛,后疑僧侣参与谋反,并信从司徒崔浩、道士寇谦之谗言,改信道教,下诏废佛,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统治者的第一次灭佛;文成帝奉佛,又令重兴佛教;献文帝好佛,退位后专心习禅;孝文帝、宣武帝大兴佛教。西魏文帝和丞相宇文泰嗜好佛教,曾建大中兴寺,设法振兴佛法。北齐文宣帝及诸帝大多好佛,文宣帝请高僧讲经,设立管理佛教机构,晚年醉心于佛,几乎不理朝政。北周明帝崇佛,建寺度僧尼;武帝重儒,下令废佛,这是佛教在中国所受的第二次打击;宣帝恢复佛教,不干涉民众信仰;静帝命全国恢复佛道地位,重立佛及天尊像,自此以后佛教又盛行。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的发展

先秦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汉代,先黄老后儒家。至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畅流，佛道（道教）滋漫，三者各有其发展过程，又彼此竞高争长。本节“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的发展”因此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道教、佛教以及玄佛道之争四个部分。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是才与性、有与无、言与意、自然与名教等问题，钟会、傅嘏、李丰、王广等论才性同异离合，使“才性四本”成为西晋至南朝清谈的主要论题，可惜这方面的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令人难究其貌；何晏、王弼等以贵无立论，确立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揭开有无之辩，其后有裴颀“崇有”欲纠贵无之弊以及郭象在向秀注《庄》基础上的超越有无之争的自生和独化；言不尽意流行于曹魏中期，蒋济、钟会、傅嘏皆曾援引之，王弼固守贵无而有得意忘象、得意忘言等贵意轻言、轻象的论述，欧阳建全面总结言意之辩以《言尽意论》终结之；玄学的政治价值在于解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以恢复儒家名教的本来权威，王弼贵无在政治上的延伸就是自然不离名教的自然与名教合的观点，竹林玄学因不满意司马氏集团，舍《老》取《庄》，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畅言名教不合自然，强烈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形成了名教与自然分、名教与自然悖的观点，郭象补王弼之偏、纠竹林之谬，以独化证明游外与冥内、自然与名教同，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大体经历正始玄学、竹林玄学、西晋玄学、东晋玄学四个阶段。正始玄学发生于曹魏正始年间，